

论赣鄱流域在汉六朝时期的社会地位变迁

党丰

(北京 100101)

摘要:汉代赣鄱流域在南北交通中的地位不及湘江流域,后者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道,其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性远在赣江之上,并通过山岭间交通孔道对赣鄱流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六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分裂与政治中心的转移使赣鄱流域深处南方腹地的区位优势得以凸显,赣鄱水道逐渐取代湘江流域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本文结合墓葬材料,对赣鄱流域在汉六朝时期的社会地位变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赣鄱流域;汉代;六朝;地位变迁;湘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6)04-0131-11

两汉时期的政治中心位于北方黄河流域,赣鄱流域(即今江西地区)^[1]尚处于统一国家的边缘地带。与之相邻的湖南地区特别是湘江一线,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道,其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性远在赣江之上。六朝以后,在南北政权分治的新态势下,赣鄱流域“襟江带湖、控荆引越”的天然区位优势得以凸显,赣鄱水道逐渐取代湘江流域成为南北交通中的重要枢纽。本文从墓葬材料入手,结合赣鄱流域的区位特点及其在汉六朝时期的水陆交通状况,尝试对本区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地位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区开发进程等作一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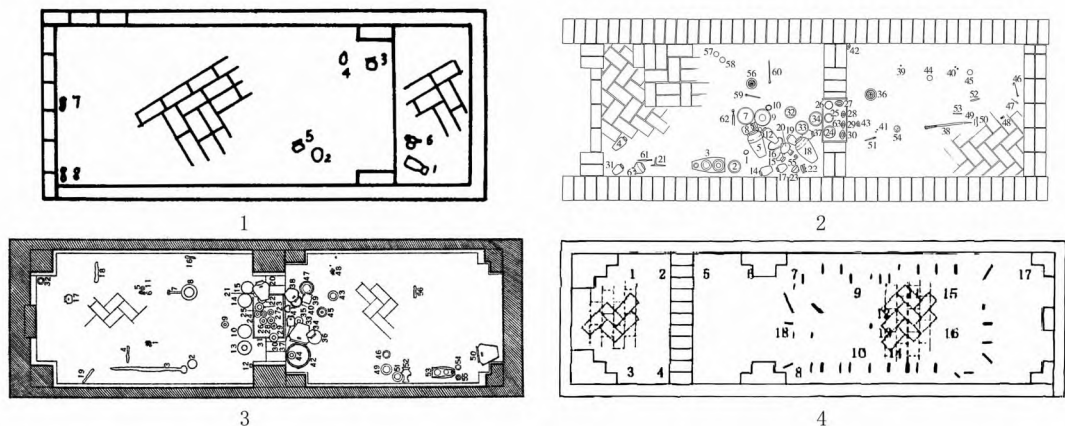
一、地理背景与墓葬概况

赣鄱流域三面环山、一面向水,东以怀玉山、武夷山脉与浙闽相分,南有大庾岭、九连山脉横亘粤北,西以幕阜山、九岭山、罗霄山脉与两湖相隔,北邻长江与鄂、皖相望。境内中南部多低山丘陵,赣州、吉泰等河谷盆地交错其间,北部湖滨平原面积广大,港汊纵横、

湖泊星罗棋布。赣江源出赣南山地,自南而北纵贯全域,加之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流域共同构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水系^[2]。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孕育了本区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而深处南方腹地的区位特点和以赣江水系为核心进而联结周边山地与长江水道的交通网络,又使其得以达成与外界的有效沟通。这样一来,保守与开放就构成了赣鄱地域文化的二重形态。

纵观赣鄱流域汉六朝墓葬发展态势,竖穴土坑墓和鼎、盒、壶等仿铜陶礼器常见于西汉时期;以狭长墓室平面与成组砖柱结构为特点的长方形券顶双室墓自东汉孕育成型,而在六朝以后又有新的发展(图一)。以圹、灶、井一套模型明器为代表的特色陶器,直到汉末吴初,其演变线索依然清晰可见。成熟瓷器于本区出现伊始便不乏对本地东汉陶器的继承与发展,稍后的吴晋青瓷群也在兼收并蓄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地方特色并有其独立的演变系统。南朝以后赣鄱流域的器物形态和组合更是基本摆脱了外地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

作者:党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一 赣鄱流域的长方形券顶砖柱墓示例^[3]

1.德安九冈岭M4(采自《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 2.南昌蛟桥M1(采自《文物》2011年第4期) 3.南昌徐家坊墓(采自《考古》1965年第9期) 4.南昌县小兰乡墓(采自《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愈发鲜明的自身特色(图二)。在这一过程中,以横前堂与穹窿顶砖室墓和更为多样的陶瓷器形为代表,来自中原、两湖、江东、岭南等地区的文化因素陆续经水陆交通网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本区,又为赣鄱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地文化因素在汲取外地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外地文化因素又于本区长久存续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表现,其间变化消长正是伴随地区开发,赣鄱流域在与周边及北方各地的人群交往与文化互动中,其地位逐渐提升的体现。而人群交往与文化互动的路径和方式不仅与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战争等突发事件的影响有关,同时也离不开自然区位条件下交通的进步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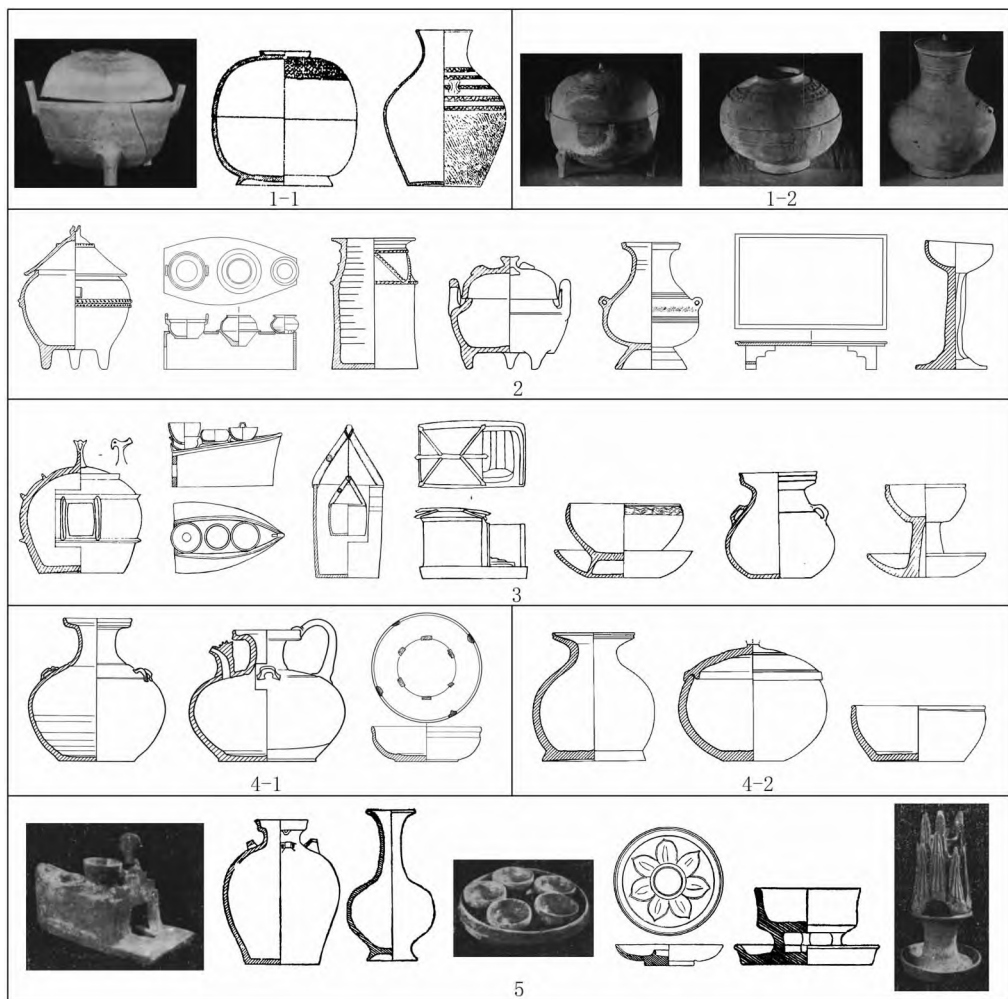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毗邻赣鄱流域的湖南地区有着与前者相似的地理环境,同样是东、西、南三面为山脉所环绕,北经洞庭湖与长江相连通,境内湘、资、沅、澧四水及其支流则顺地势自南而北汇入洞庭湖。其中,位于湖南东部的湘江流域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交通南北的要务,赣鄱流域在汉六朝时期的地位变化与湘江一线的历史变迁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汉代南北交通中的湘、赣比较与互动

所谓“自秦迄汉,皆出五岭,威百越,赣之不能无事可知也”^[4]。秦与汉初,“豫章尚为边郡,而汉制羁縻蛮越,多在此处”^[5],赣江一线交通地位的初步凸显与秦汉国家对岭南与闽中的军事行动有关。但就一般意义上的人员、物资和信息流通而言,此时开发尚浅的赣鄱流域在汉代南北交通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而于秦攻百越与汉平南越等战役中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湘江一线,才是自关中或伊洛经南阳盆地而下、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道。与此相适,两湖地区包括湘中南一带在墓葬文化上也表现出相当的优越性。

这里可以首先选择在赣鄱流域出现较晚或不占主流,却在湖南地区有着较早或集中发现的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室墓与具有岭南特色的器物作为切入点,来观察湘、赣两地在汉代南北交通中的地位差异(图三)。

以东汉时期普遍见于中原和关中地区以及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室墓为例,受南方地区开发程度的限制,汉末三国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砖室墓皆以结构相对简单的券顶砖室墓为主,穹窿顶砖室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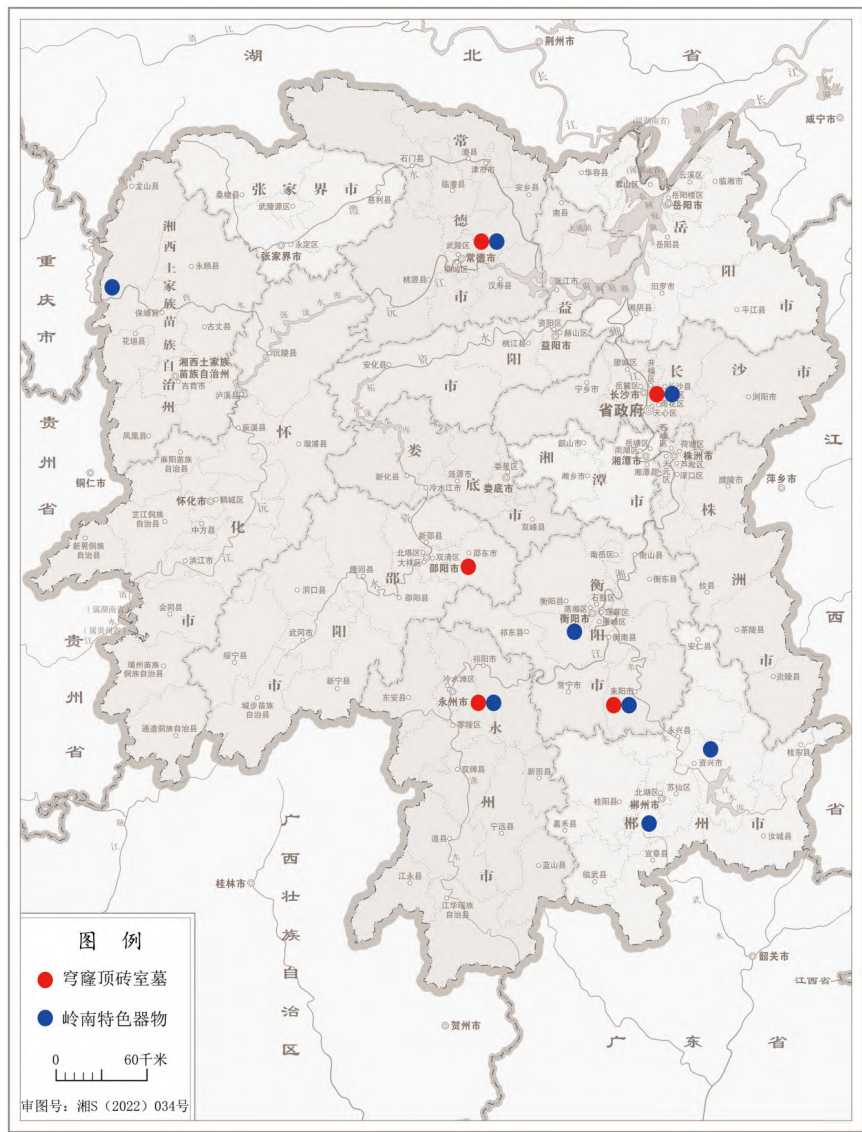
图二 赣鄱流域的部分典型器物示例^[4]

1-1.南昌老福山西汉墓(采自《考古》1965年第6期) 1-2.南昌东郊西汉墓(非同墓器物,采自《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2.南昌蛟桥东汉M1(采自《文物》2011年第4期) 3.吉水富滩东吴墓(采自《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4-1.南昌花博园东晋墓(非同墓器物,采自《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4-2.南昌星辉加油站东晋M2(采自《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5.清江山前南朝墓(非同墓器物,采自《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文物资料丛刊》8)

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发现主要集中于湖南境内,如常德^[9]、长沙^[9]、邵东^[10]、永州^[11]、耒阳^[12]等地,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中国北方地区相提并论,但这些发现地点却清晰勾勒出此类于洛阳一带率先出现、而后才向南方扩散的墓葬类型,越长江而下、沿湘江及其支流继续向南传播的态势。反观赣鄱流域,本区砖室墓的出现和流行时间本较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为晚,大约到了汉末东

吴早期才有南昌县小兰乡^[13]、吉水城郊M1^[14]等叠涩穹窿顶砖室墓(图四),而像发券穹窿一类顶部结构更为复杂的墓葬于东汉之世更是十分罕见^[9]。六朝以前,湘江一线与赣江一线在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中的不同顺位由此可见一斑^[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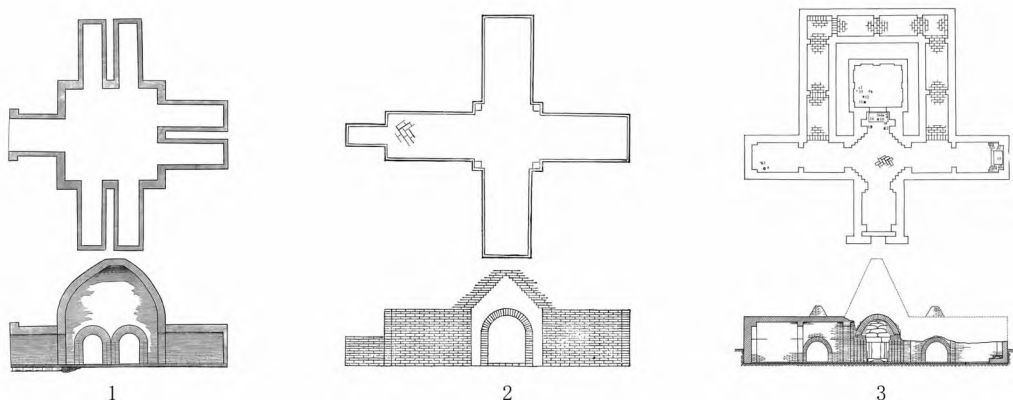
至于具有岭南特色的铜器与陶瓷器,包括与岭南地区同类器风格近似的本地产品在內,自西汉中期于赣鄱流域出现后便集中分布



图三 湖南地区汉代穹隆顶砖室墓与岭南特色器物分布示意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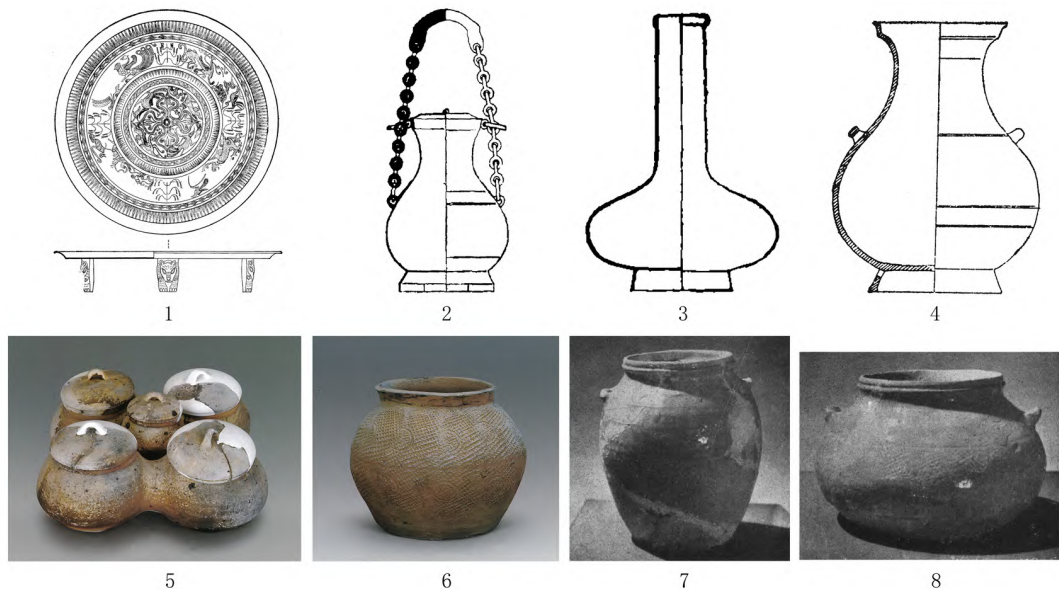
在南昌一带^[17],其他发现仅见萍乡莲花安成侯墓等个别地点^[18]。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湖口^[19]、樟树^[20]、吉水^[21]等地才有了单座墓例的零星发现(图五)。上述墓葬地点颇有以南昌为中心、沿赣江及其支流向南北两侧扩散的趋势。其中,南昌作为豫章郡治即区域政治中心所在,包括岭南类型器物及其仿制品在内,各类物质资料大量汇集于此自然无可非议。从理论上讲,源于南方的物资及其背后的人群和文化要北入南昌等地,沿赣江顺流而下似乎应

是最佳选择。但事实上,就目前刊布的考古材料而言,岭南类型的产品在本区汉墓中的分布却始终仍以赣中北为重,赣南地区的有关发现几近空白。相比之下,湖南境内的有关发现则显得蔚为壮观,特别是地近岭南的湘南一带,不仅相关墓葬数量众多,而且如永州鸛子岭M2^[22]、郴州奎马岭M2^[23]、资兴东汉墓^[24]、耒阳东汉墓^[25]等所见,不少墓葬中的岭南类型器物一经出现便是数件乃至十数件不等,遑论单件器物的零星出土。稍偏北侧的衡阳^[26]、长沙^[27]



图四 湘、赣地区的穹窿顶砖室墓示例

1.长沙沙湖桥A·M41(采自《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2.南昌县小兰乡墓(采自《考古》1993年第1期)
3.吉水城郊M1(采自《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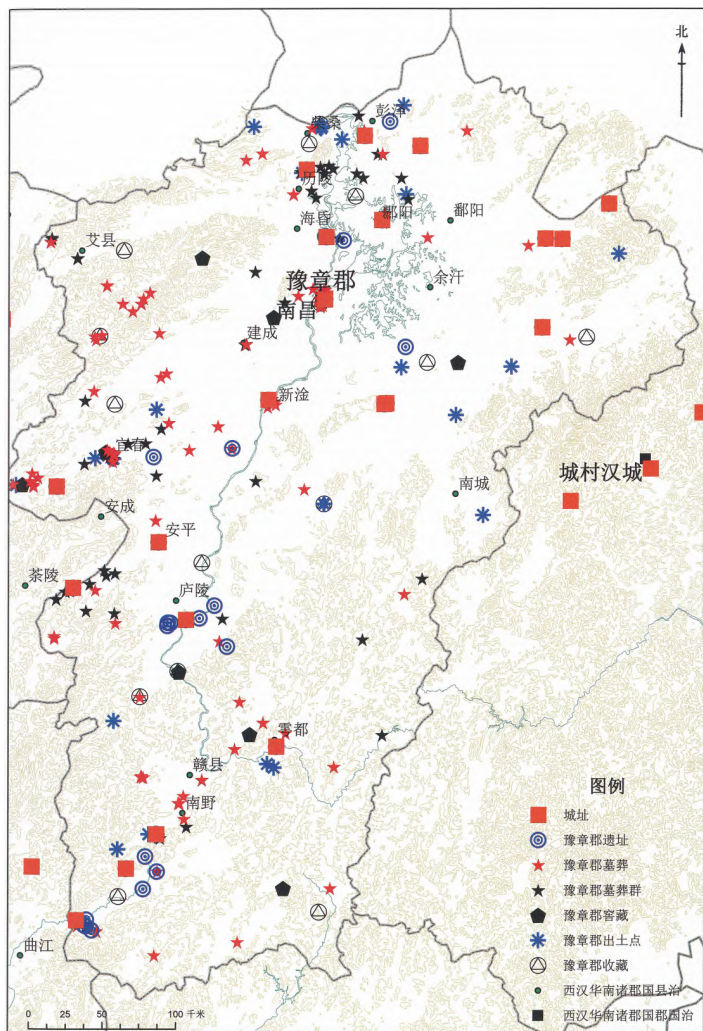
图五 赣鄱流域的岭南特色器物示例

1~4.南昌京家山M2(采自《考古》1989年第8期) 5、6.萍乡莲花安成侯墓(采自《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彩版六四-1、彩版七二) 7、8.清江武陵M2(采自《考古》1976年第5期)

等地有关发现虽不及前引墓葬丰富,但也并不比赣中北地区逊色。这些墓葬地点同样位于该区主要水系即湘江及其支流沿岸,却明显表现出自南而北、从早到晚、由多及少的传播过程,这无疑是汉代岭南文化因素顺湘江而下、大规模北传的明证。而湖南北部沅江流域的常德^[28]、龙山^[29]等地少量岭南类型或仿岭南

类型器物的出土亦不失为湘江通道之旁证^[30]。

虽然不能排除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因素,但汉代赣江一线穹窿顶砖室墓的阙如、具有岭南特色的器物南北分布的悬殊,及其与湘江流域形成的鲜明对比,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赣江通道绝非中原墓葬形制南传或岭南类型器物北进的主要途径。湘、赣两地在汉代南北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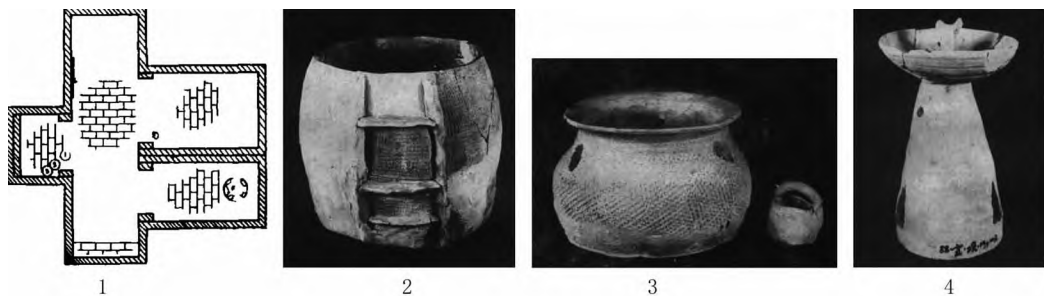


图六 赣鄱流域汉代遗存分布示意图

(采自《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第607页“豫章郡遗存分布图”)

中发展不均而地位有别。究其原因，两汉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国家统治重心所在，对中央政府来说，为了实现与以番禺或苍梧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的有效沟通，最直接且便捷的方式莫过于经由鄂豫之间的交通孔道南下而穿越长江流域。如此，较之稍偏东侧的赣鄱水道，更加正对郡城的湘江一线无疑是首选之地。另一方面，于岭南地区而言，湘江上游所在的长沙国或桂阳郡向来是其与五岭以北往来互动的最前锋。无论是西汉前期南越政权与汉朝军队的两相对峙，抑或汉武帝平南越以后将岭南北部纳入桂阳郡管辖范围，在双方的军事活动或共同的行政区划下，岭南地区必然会或被动或主动地与湘南一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峽道”以后，旧“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的交趾七郡贡献转运亦过五岭、经此“常路”、再取道湘江北上^[3]。由此，湘江一线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道更是在情理之中了。

南北之间人员、物资和信息



图七 宜春地区的相关发现示例

1、2.宜春下浦坝M70 3.宜春下浦坝M40 4.宜春下浦坝M79
(采自《江西文物》1991年第2期)

的流通带动了湘江流域经济、文化的进步乃至政治重要性的增长。反观六朝以前的赣鄱流域,作为“吴头楚尾”,不仅自身开发进程缓慢且基础薄弱,而其西、南两侧来自两湖与岭南地区的影响已如上述,东侧又有汉武帝两次徙民处江淮间而“东越地遂虚”^[32],加之近海航运的发展,这些均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本区水陆交通网进一步向旁侧伸展的可能。这样一来,在南方内部的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中,地位远在赣江之上、物质文化也更加发达的湘江流域自然成为赣鄱流域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

除非特殊情况下的辗转迁徙,否则湘江流域与附近人群及其所创造或携带的物质文化要进入赣鄱流域绝不可能舍近求远,势必依靠湘、赣两地间由西向东的陆路交通。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观察赣鄱流域汉代墓葬等各类遗存的分布地点可以发现(图六)^[33],除了以南昌为中心的赣江干流中下游及赣江上游沟通岭南的西源章水沿岸以外,本区西部武功山南北两侧的谷地,特别是赣江支流袁水一线的萍乡、宜春、新余等地的有关发现也相对集中,且其中不乏时代较早者,而锦江、禾水沿岸的部分发现同样可作为前者的重要补充。虽然不能排除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墓葬文化由地区中心即郡治南昌向外扩散所致,但如宜春下浦坝M70为本区出现较早的前堂横列式并列双后室墓^[34],而此类墓葬结构在湖南宁乡^[35]、耒阳^[36]、资兴^[37]、郴州^[38]等地有着更多发现。其他包括该墓出土的深腹平底陶甗以及同墓群所出束颈矮腹陶井、镂孔陶灯等在内(图七),相比于南昌以外的其他地点,这种非赣鄱本地传统而更多见于两湖、岭南地区的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在此一线更早且更多的发现,正揭示了该区域与湘江流域之间的紧密关联。

此外,如上文所述,目前所见赣鄱流域汉墓中的岭南类型器物也主要集中在以南昌为中心的赣中北地区,毗邻岭南的赣南一带还少有发现。若非考古材料本身的影响,那么此时沿大庾岭横浦关道自南而北进入赣江流域的通道,并非岭南文化因素在本区传播的主

要途径。考虑到湘赣之间的密切联系,赣鄱流域所见各类岭南产品及其仿制品可能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湘中南地区为中转、通过武功山南北两侧的谷地才间接输入本区,而这也可以在政治因素之外进一步解释赣西的萍乡何以在西汉中晚期便出现了与岭南地区同类器风格近似的产品。事实上,就古之行政区划而言,出有不少岭南类型陶瓷器的萍乡莲花安成侯墓本就属西汉长沙国的范围。三面环山的地貌特征确实为赣鄱流域设立了天然的地域屏障,但古今行政区划在重叠之余的犬牙交错却提示我们不能拘泥于地区间人为划定的行政版图,被圈隔在华夏网络中的南方山地作为自有生命力的鲜活整体,同样具有借助山中交通线联络两侧华夏节点的能力^[39]。

三、六朝时期湘、赣地位的逆转

汉末天下三分,南北政权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对峙打断了秦汉统一王朝的有序发展,却为此后南方社会之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契机。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汉末吴初的北人南迁与南方政权的建立不仅意味着赣鄱流域开发进程的加快,同时来自都城的主流文化的辐射方向也发生了相应改变。

如上文所述,横前堂与穹窿顶砖室墓作为源自中原地区的墓葬类型,六朝以前在长江以南、五岭以北主要分布在湘江一线,这无疑与汉代北人南下的路径有关。二者在赣鄱流域的少见与晚出正是本区开发尚浅、文化亦不发达的表现。更进一步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背后的主体即当地人群的力量薄弱有关。直到东汉末年,在北方战乱频仍与孙氏立国江东的大背景下,包括社会上层人物与地方豪强大族在内,较之以往更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以及人口在南方内部的流动,不仅为曾经落后的长江中下游各地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化与生产技术,更留下了一批拥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进行地区开发与文化创造的社会群体。取决于当时人口迁徙的主要方向和此前赣鄱流域的开发基础,



图八 周边地区影响赣鄱流域的相关发现示例

1.瑞昌马头西晋墓(采自《东方博物》2021年第4期) 2、3.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采自《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4.株洲赐金岭M1(采自《湖南考古辑刊》2018年)

以南昌为中心的赣中北一带自然首当其冲,成为这一时期本区内部人群往来与文化互动的最前锋。而另一方面,东吴一朝外有魏、蜀军事威胁,内有山越频繁暴乱的现实境况,也使得地近长江、北邻丹阳的赣中北地区政治重要性大幅增长。正如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中大规模家族墓地与高等级墓葬所见^[40],突然出现这样一批规模庞大且技术成熟的横前堂与穹窿顶砖室墓绝非偶然,北人南下的客观条件、镇抚山越的军事需求,以及在此背景下入驻本区的重要人物、强宗大族及其此后的数代经营,才是新兴墓葬文化得以维系并发展的有力支撑。

事实上,就山越问题而言,无论“未尝入城邑”的“幽邃民人”还是“咸共逃窜”的“逋亡宿恶”^[41],如此庞大的群体既不可能凭空出现,亦不可能突然消失。史料所见这一蜂起于东吴而集中在湘江流域以东,特别是皖、浙、赣、闽交界地带的山地人群的异常活跃及其与华夏人群的冲突加剧,正是在北人南迁与孙吴建国的外力作用下,各方势力对人口、土地等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原本地广人稀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发进程也随之陡然加速和深入的结果。

相比之下,地理位置与地形条件不如赣中北地区优越、在汉代发展程度亦不及前者的赣南地区,于六朝时期的开发进程就显得温和而平缓得多。墓葬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墓葬数量的增加与分布地点的扩散,特别是东晋以后。而如横前堂与穹窿顶砖室墓一类来

自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以砖石合构的吉水城郊M1为最南分布地点^[42],此地以南暂无发现。长江中游或下游窑场青瓷产品的直接输入和困、灶、井等建筑类模型明器同样比较少见。形制相对简单的凸字形或长方形券顶砖室墓,以及属赣鄱本地特色的青黄釉、青绿釉瓷质生活类、祭奠类明器组合等,仍是六朝时期赣南地区墓葬文化的主要内涵。此时深入赣南丘陵山地的开发者若非早已在此繁衍生息的土著人群,也很有可能是部分最初生活在赣中北地区、更早接受核心汉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渗透的赣鄱本地人群。他们在汉末吴初与两晋之际一次次人口迁徙的浪潮中,逐渐溯赣江而上向着更远的深山走去,并以其相对先进的物质文化带动了赣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至于这一时期的南下北人,即使有深入此地者恐怕也不会太多,并且极少有雄厚的实力,因此他们在到来不久便很快融入地方社会了。赣鄱流域六朝墓葬的文化面貌所呈现的南北差异也正是上述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人群交往与文化互动以及与之相关的赣中北与赣南地区开发进程差异的体现。

以上主要是就赣鄱流域内部的发展状况而言。放眼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自东吴始南北划江而治,包括墓葬文化在内,来自都城核心区域建康(业)与次一级政治中心古武昌一带的影响,不必再经过地区间的层层传递便可直接进入赣鄱流域。如九江、南昌等地出土的越窑青瓷或长江下游地区的典型器^[43],以及青瓷坞堡模型等属长江中游文化系统的高等

级随葬品所见^[44](图八,1、2),此时东西向的长江水道及与之相连的赣江水系在有关本区的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来自赣鄱流域西侧即湘江流域的影响已在本区完全消失。后者在汉代南北交通中确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优势,以及湘、赣两地间持续日久的人群往来,不会随着朝代改易而瞬间崩塌或彻底断绝。特别是六朝前期,在赣鄱流域新的地方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仍有部分青瓷器可在湘中南地区发现更早的造型来源。例如,吉水富滩东吴墓、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等出土的横截面呈半圆形的尖尾船形灶在本区暂不见其自成序列的演变线索^[45],但造型与之类似的陶器却在东汉中晚期的两湖地区有着较多发现^[46](图八,3、4)。韦正在谈及赣中南与湘中南地区的联系时也曾指出“东吴后期至东晋早期,吉水、清江、南昌等地墓葬中的高圈足钵、研磨器、牲寮或仓房与耒阳、资兴、衡阳、郴州等地墓葬中的出土物十分相似”^[47]。不过,这些器物与湘中南地区的同类器并不完全相同而更具地方特色,可能已成为周边地区文化影响下的本地产物。

虽然湘、赣地位的逆转并非一蹴而就,但其间此消彼长却是历史的必然。六朝时期,统一国家的分裂与政治中心的变迁使赣鄱流域占据了南方政权版图的中心位置,其“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48]的天然区位优势开始逐渐显现。特别是经过汉至东吴数百年的发展,与西晋一朝短暂统一的平稳过渡,到了东晋以后,门阀士族之间的荆扬之争使得江州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大幅提升,本区核心命脉即赣江一线“南通五岭,北导长江”^[49]的水运交通也随之取得了长足发展,再进一步便取代了此时于都城建康而言已相当偏远的湘江一线在南北交通乃至东西交通中的枢纽地位。正如上文所述,赣南一带墓葬数量的增长与分布地点的扩散,即赣鄱流域六朝墓葬主要循赣江及其支流沿岸自北而南、溯流而上的动态发展,正与赣鄱水道的大规模开

发与利用密切相关。同时,赣江水系南侧大庾岭与东南武夷山等山岭间交通孔道的渐次开通,也为赣鄱流域墓葬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东晋中期至刘宋岭南地区砖柱墓的成批出现、南朝中晚期闽西北被纳入江州文化系统等,便是赣鄱地域文化显著增强且影响经由水陆交通网向外扩散的结果。反观这一时期的湘江流域,非但难以对赣鄱流域施加影响,其自身的墓葬面貌也在缓慢地向湖南北部靠拢而逐渐丧失地方特色,湘中南一带曾经的文化优势与独特性已然不再^[50]。

联系赣中北地区在东汉六朝初期的发展轨迹,可以想见梁末侯景之乱中南川酋豪的趁势崛起与割据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东吴时期以山越问题为核心、以激烈冲突为表现的山地人群与华夏人群间往来方式的再现。而后者甚至是对更早阶段荆州、交趾蛮越屡叛的重演。只是随着赣鄱流域尤其是赣江上游地区的深入开发与“幽邃民人”的大幅开化,这一过程不仅向着包括赣南山地在内的江、湘、交、广诸州的深远腹地继续蔓延,以江州酋豪为代表,发展程度高于以往的土著豪族之向背也成为影响陈朝立国与政局走向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区墓葬文化所体现的赣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与本地传统的进一步强化更可谓是情理之中了。至于闽西北与赣东南之间的强烈关联,除了考虑二者同属江州政区以外,亦可在东汉时期的湘、赣互动中找到与之相似的注解。经由山中交通线完成的東西向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依然存在,但不同的是,此时赣鄱流域已然取代了湘江流域成为新的文化发达之地。而毗邻的福建地区则在经历了“东越地遂虚”的社会停滞与吴晋时期的初步开发以后,于墓葬文化由西向东的逐步推进中成为了数百年前的“赣鄱流域”。

四、结语

两汉时期,国家统治重心位于北方黄河流域,湘江流域凭借其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取得了文化乃至政治、经济上的长足发

展,并进一步通过山间谷地对赣鄱流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此时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下,深处南方腹地、开发程度有限的赣鄱流域尚未展现出足够的区位优势,在与周边地区的人群交往与文化互动中也常常处于被动位置。但两汉以来由各种社会动因所促成的强制性或自发性人口迁徙早已为原本落后的南方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化,而这些文化在进入赣鄱流域以后与本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为本区的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六朝以降,南北政权的分裂与政治中心的转移改变了都城主流文化的辐射方向。赣鄱流域除了延续与湖南、两广、浙闽等地或深或浅的文化交往与互动以外,来自古武昌和建康(业)所在的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也于本区得到了进一步凸显。从东晋时期门阀士族荆扬之争,到南朝前期出镇宗王挑战建康权威,再到梁末陈初“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郛壁之豪”^[1]趁势崛起并直接影响陈朝国运走向,内可屏藩下游朝廷、外可形援上游方镇的江州重镇在东晋南朝政局中的战略地位便愈发举足轻重。水陆形便的赣鄱流域最终取代了两汉时期的湘江流域,成为南中国范围内交通四方的枢纽地带。

注释:

[1]徐莘芳:《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展示》,《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0日第4版。

[2]由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流域及鄱阳湖区组成的鄱阳湖流域,其覆盖范围与江西省省域高度重合。

[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德安九冈岭汉墓群》,《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樊昌生、徐长青、张文江等:《江西南昌蛟桥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4期;李家和:《江西南昌徐家坊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9期;王上海、刘慧中、李育远等:《江西南昌县小蓝乡西晋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4]郭远谓:《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汉木槨墓》,《考古》1965年第6期;陈文华:《南昌东郊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樊昌生、徐长青、张文江等:《江西南昌蛟桥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4期;李希朗:《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田庄、胡振、彭伟楸:《江西南昌市梅湖景区花博园六朝家族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李育远、李国利、戴仪辉等:《江西南昌市星辉加油站东晋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傅冬根:《清江县山前南朝墓》,《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该墓材料后收入文物编辑委员会

编:《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68~73页。

[5](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记要》卷八八《江西六》,中华书局,2005年,第4053页。

[6](清)王谟撰,习显华点校:《江西考古录》卷一《郡邑·新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7]底图源于标准地图服务系统(<http://bzdt.ch.mnr.gov.cn>),审图号:湘S(2022)034号。本图为分布示意,主要标注了墓葬所属地级市或县级市的大概位置。

[8]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常德东汉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8~176页。

[9]李正光、彭青野:《长沙沙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10]曾少华:《湖南邵东县冷水村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2年第10期;另外,湖南邵阳白仓东汉墓中“墓室为近正方形,墓砖为自四角至中部起券顶”者可能为穹窿顶,参袁伟:《邵永高速公路白仓东汉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

[11]贺刚:《冷水滩市老祖坡汉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第354~355页。

[12]高成林:《耒阳市廖家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第355~356页。另有一些穹窿顶砖室墓见诸新闻报道,但尚未发表正式材料。

[13]王岚:《江西南昌县发现三国吴墓》,《考古》1993年第1期。

[14]胡胜、叶翔:《江西吉水县晋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简报断该墓年代为西晋早期,存疑,可能早至汉末吴初。

[15]近年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发现若干座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室墓,据笔者了解,其年代不早于汉末吴初。

[16]有关汉代穹窿顶砖室墓在湘、赣地区的传播具体论述可参党丰:《汉晋时期江西历史地位的变迁——以墓葬材料为中心》,《南方文物》2021年第4期。

[17]陈文华:《南昌东郊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许智范:《南昌市老福山西汉墓》,《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3期;陈定荣:《南昌市京家山汉墓》,《考古》1989年第8期。

[1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萍乡市莲花县文物办编著:《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9]杨赤字:《湖口县象山东汉纪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2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樟树薛家渡东汉墓》,《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黄颐寿:《江西清江武陵东汉墓》,《考古》1976年第5期。

[21]同[14]。

[22]郑元日、唐青雕、邓少年:《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

[23]郴州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郴州市奎马岭汉墓的发掘》,《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9~105页。

[24]傅举有:《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25]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00~166、381~388页。

[2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古墓与古窑址》,岳麓书社,2004年,第61~68、109~112、132~136页。

[27]同[9]。

[28]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常德博物馆、鼎城区文物局等:《沅水下游汉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81~92页。

[2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第612~613页。

[30]有关湘赣地区发现的汉代岭南类型陶瓷器的具体论述可参杨哲峰:《试论两汉时期岭南类型陶瓷器的北传及影响》,载《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5~218页;该文后收入《汉唐陶瓷考古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92~218页。

[3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郑弘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6页。

[32](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84页。

[33]刘瑞曾对秦汉时期华南地区各类考古遗存如墓葬和墓葬群、遗址、窖藏、出土点、收藏点等做过详细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参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3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春市博物馆:《江西宜春下浦坝上古墓群发掘报告》,《江西文物》1991年第2期。

[35]何赞:《湖南宁乡狮山汉代墓地M10、M25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3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36]同[25]。

[37]同[24]。

[38]李荆林:《湖南郴州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8期。

[39]有关华夏网络与南方山地的具体论述可参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3~201页。

[40]国家文物局主编:《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24~128页。

[41](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1页。

[42]同[14]。

[43]参张文江:《江西地区东吴两晋墓出土的越窑青瓷》,《东方博物》2021年第4期。

[44]同[40]。

[45]李希朗:《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国家文物局主编:《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24~128页。

[46]王峰:《湖南株洲石峰区踢金岭东汉砖室墓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3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47]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48](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49](晋)王隐:《晋书地道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9页。

[50]有关湘中南地区的具体论述可参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第109~113页。

[51](唐)姚思廉:《陈书》卷三五“史臣曰”,中华书局,1972年,第490页。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during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

DANG Feng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Ganjiang River-Poyang Lake Basin (Ganjiang-Poyang basin) played a less prominent role in north-south communication than the Xiangjiang River valley. The latter, which served as the main corridor connecting the Central Plains and Lingnan, was of considerably greater significance to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than the Ganjiang River and exerted a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via mountain passes and intermontane corridors. In the Six Dynasties, however,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lities and the consequent southward shift of political centers brought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s interior location within the southern heartland into strategic prominence. The Ganjiang-Poyang waterway gradually supplanted the Xiangjiang River valley as a crucial node in north-south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Drawing upon mortuary data from excavated burial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nging social status of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from the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Six Dynasties and addresses a range of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Ganjiang-Poyang basin; Han Dynasty; Six Dynasties;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atus; Xiangjiang River valley

(责任编辑、校对:马志亮)